

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

及其诗学实践研究

王培友 / 著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三代之隆，其法弥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同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长，则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于为君，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慎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

能及也。

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 及其诗学实践研究

王培友／著

本书受『北京语言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资助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 / 王培友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305-16447-7

I. ①两… II. ①王… III. ①理学—研究—中国—宋代②诗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B244.05②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198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
著 者 王培友
责任编辑 朱湘铭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593963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17.25 字数 310 千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447-7
定 价 45.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序 言

李炳海

培友博士的新著《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即将付梓，嘱予为之作序。我在欣然应诺之际，也有几分犯难。虽然对宋代诗文有所浏览，但是，对宋代理学却未曾有过钻研，实在不知从何谈起。唯一能加以弥补的方式，就是认真阅读这部著作。我怀着先睹为快的喜悦，通读了这部书稿，确实有许多启发和感受，略陈于下，以与培友博士及学术同道交流。

—

这部著作的名称是《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顾名思义，是以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为中心展开论述，属于专题研究著作，是名副其实的学术专著。它的可贵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成功地进行了专门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思潮与文学的关联，是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主要涉及两汉经学与文学、魏晋玄学与文学、两宋理学与文学等。其中魏晋玄学与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早，已推出一系列颇有创见的成果。而其他几个领域的研究，却至今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魏晋玄学与文学的研究，近期亦处于停滞状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缺少深入的专门研究。无论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还是各类社科基金项目，这类课题往往追求覆盖面的广阔、体系的宏大，而忽略个案的专题研究。结果是大而无当、浮泛空疏，所作的论述流于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学术亮点甚少。培友博士的这部著作则别开生面，聚焦于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至于两宋理学与文学相关的许多其他问题，则暂时搁置，或是必要时略作交代，而不加以扩展。这就使得全书有一以贯之的线索，能够集中力量作深入的探讨。

这部著作总体上属于专题研究的类型，具体到各个章节，也有许多专题研究

的内容。从标题上看,第四章是理学家文道观的类型、特征的专题研究,第五章是两宋理学家文道观之“文”、“道”内涵及其与道器观的矛盾性问题的专题研究,第六章是文道关系思维特征的专题研究,第八章是文道观念与诗学范畴、诗歌品格建构等关系的专题研究。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把文道观念与诗学实践这个专题拆解成几个小板块,分门别类地加以探讨,从而使得所作论述更加具体和深入。然而,这部著作专题化的运作方式,并不是到章的层面为止,而是还在继续深入,落实到许多个案的处理上。即以第八章为例,第一节集中论述朱熹的“气象近道”的理念,第三节集中破解“观物”与理学诗的类型化主题及程式化表达等问题,都是专题研究的典范,新见颇多。而在论述朱熹“气象近道”理念一节,又专门以韦应物的诗为例加以阐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这部著作专门化的运作方式,实际上是一个深加工、精加工的过程。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条分缕析,深入开掘,从而避免了论述的浮泛空疏。全书由不同层次的专题研究作支撑,既有牢固的地基,又有可供不断提升的台柱,形成了立体研究的架构,这是非常难得的。

二

冯友兰和金岳霖先生分别是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前者称自己治学路数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后者则称自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概括得颇为精到。对于文学和文化研究而言,这两种方法都是需要的,关键是能否运用得恰到好处。

培友博士这部著作以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诗学实践为研究对象,在具有普通古代文学常识的人看来,理学家的文道观无非是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之类的命题,涉及的是道统与文统的关系,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可是,这部著作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并没有作简单化处理,而是从多个侧面揭示出它的复杂性、丰富性。这在第一章、第四章到第七章体现得特别明显,仅从章节标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文道观方面,宋代理学家有的主张“重道轻文”,有的主张“作文害道”,有的主张“文道两分”,还有的主张“调和文道”。在道器观方面同样有多种看法。至于理学家文道观念与他们的诗歌创作实践,也往往出现相背离的现象。上述差异和矛盾不但体现在不同的理学家之间,即使是同一位理学家,他的理论体系,他的观念和创作实践,也往往自相矛盾,无法协调一致。全面揭示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诗学实践的复杂性、丰富性,是培友博士这部著作的重要贡献,也

是它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原因之一。

邵雍、周敦颐、程颢、朱熹等都是宋代理学家，这是他们身份的相同之处。可是，他们的文道观及诗学实践却各有特色、不相一致，彼此存在差异。对于宋代理学家的文道观及诗学研究实践，既看到相同之处，把他们与文章之士、传统儒学之士区别开来，同时，又揭示他们文道观及诗学实践存在的差别，这种兼顾同和异的思维方式，是学术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当下的许多学术论著中，经常出现或是求同而忽视异，或是关注差异而忽略一致性的倾向，认识上出现片面、偏执，得出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总之，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是一门学术功夫，也是辩证思维的具体运用。

这部著作在揭示宋代理学家文道观及诗学实践的复杂性、丰富性方面用力颇多，并且取得良好效果，确实展现出众多理学家在文道观及诗学实践方面的不同走向。即以程颢和朱熹为例，两个人的差异就很鲜明。程颢时而强调文以载道，时而又把圣人气象作为道体的表现。而朱熹的道与文的本末之说，倒是比较一贯的。再从诗歌创作来看，朱熹认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他的代表作《观书有感二首》之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阐发的是《孟子·离娄下》心源有本的理念，他的这首诗确实是从道中流出。培友博士这部著作把程颢诗概括为“程颢欲静中体贴天地万物，与人生机打成一片，常常强调以‘吟风弄月’、‘体贴生意’为手段，以诗歌的‘感兴’来求‘道’”，他的理学诗代表作《偶成》、《春日偶成》确实是这种境界。其中《偶成》诗结尾两句：“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虽然是化用《孟子·滕文公下》的句子，但具体取向与朱熹的《观书有感二首》之一明显不同。总之，这部著作在揭示宋代理学家文道观及诗学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亮点颇多，对以往同类著述实现了历史性的超越。

三

这部著作第六章，把宋代理学家处理文道关系的思维特征概括为正名和归元，得出的结论颇为精到。由这个专题研究的性质所决定，其中有许多正名和归元案例可供探讨，有时二者可以结合在一起加以辨析。

这部著作第八章用相当大的篇幅对宋代理学家所说的气象加以辨析，揭示出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果进一步从源头上加以追溯，就会发现气与象连言并非偶然，而是与先秦的道论密切相关。《周易·系辞上》称“一阴一阳之谓道”，

道的载体是阴阳,而阴阳指的是气。《老子》第四十二章写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是冲虚之气,亦即阴阳二气,这是秉持气本元论的理念。《周易·系辞下》又写道:“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这里的坤、乾,分别指阴和阳,亦即作为道体的冲虚之气。冲虚之气的显现为象,成形为器。象、器都是由作为道体的阴阳二气所派生,因此,气象连言、道器对称也顺理成章。宋代理学家以气象论道,运用的确实是归元思维,带有正名的性质。

这部著作第四章第一节提到邵雍的如下主张:“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之矣。”这段话的后半段出自《老子》第五十四章,如何理解《老子》原文的本义,对于阐释邵雍的观物理念至关重要。对于《老子》第五十四章所说的“以天下观天下”,王弼注:“以天下百姓心,观天下之道也。”照此说法,《老子》上述一段话所强调的,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加以审视,后代及当下基本都是作这种解释,带有唯物学派认识论的味道。从《老子》一书整个体系考察,上述解释是一种误读,不符合原文本义。《老子》所说的“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指的是内视、自我观照,是收视反听的内里功夫,观照主体和观照对象同为一体,没有主客之分。邵雍的观物理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继承《老子》的学说。这部著作第六章第四节引述邵雍《观物内篇》的如下话语:“人亦物也,一物当兆物。”“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能反观也。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以物观物之谓也。”这段话说得很透彻,他是从反观意义上借鉴《老子》的论述,对原文的理解是正确的,远胜诸多注家。沿着这个思路去解释邵雍的理学诗,必定会开辟出新的学术天地,同时也实现了归元和正名。

在宋代理学家中,把文和道相对立的当首推程颐。他认定为文是玩物丧志,作文害道。他的这种看法,如果作追本穷源的探索,很容易从《老子》第十二章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论证中找出源头。可是,如果进一步追寻,还会发现这种观念与中土早期佛教的关联。《高僧传》卷七有如下记载:

释僧彻,姓王,本太原晋阳人。……彻年十六入庐山,造见远公。……于是投簪委质,从远受业。遍学众经,尤精波若。又以问道之暇,亦厝怀篇牍。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尝至山南攀松而啸,于是清风远集,众鸟和鸣,超然有胜气。退还咨远:“一吟一啸,可得为乎?”远曰:“以散乱言之,

皆为违法。”由是乃止。

释僧彻有文才，在他身上先前体现出的是魏晋名士风度。可是，经东晋高僧慧远的一番教诲，他便与咏啸绝缘。把慧远的话语与程颐的文以害道之论相比，二者极其相似。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该部著作进行归元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供拓展。

这部著作第五章第一节提到魏了翁的如下话语：“凡物之相错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这里对于文所下的定义，同样具有归元的性质。《周易·系辞下》称：“物相杂，故曰文。”《国语·郑语》称：“色一无文。”韦昭注：“五色杂，然后成文。”中国古代早期所说的文，指的是不同因素的相互错杂，是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属于广义的文。宋代理学家魏了翁把文明、文化都称为文，实际上是向“文”字原始本义的回归，亦属于归元系列，同时也是在正名。总之，宋代理学家在文道观方面归元正名的思维方式，许多有价值的因素有待深入发掘。培友博士这部著作已有较好的开端，也预示着更加美好的学术前景。

四

当今是信息网络时代，学术信息的获取已经是轻而易举之事。能否搜集、阅读较为全面的文献资料，已不再是学术研究的主要障碍。学术研究的成败、学术著作价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已由学术资料的获得，转向为对学术信息的处理加工。培友博士此部著作在这方面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可供借鉴，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之路上不断前行的足迹。

我有幸参加了培友博士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和答辩。当时他的论文是以宋初百年文学总体走势为研究对象，覆盖面很广，直接征引的古代文献多达数百种。与会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对如此众多的学术信息能否进行妥善的处理，是否具备披沙拣金、集腋成裘的能力。当时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培友博士当年撰写博士论文所遇到的最大困扰，就在于此。

和当年的博士论文相比，这部著作对学术信息所作的处理，已经摆脱困扰，显示出比较娴熟的技巧。这部著作涉及数量众多的文献，而以宋代理学家的原典居多。尽管如此，作者对密集的学术信息处理得颇为得当，充分地发挥出它们的效应。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关键词的筛选和阐释做得很到位。这部著作全书有它的关键词，各章节及段落也有它们的关键词，总计多达百

余个。关键词的选择,体现的是学人的见识。慧眼识珠,才能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发现有学术价值的关键词语和句子。这部著作所选择的关键词语和句子确实很有代表性,有许多是理学和古代文学核心概念、经典命题,这种选择本身就是高水平学术著作的起点。

近些年来,关键词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领域,已有《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等成果问世。但是,把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是要编纂词典,而是要对它进行具体深入的阐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

倘若我们是要对中华文化原典进行关键词研究而不是对中华文化进行词汇/术语汇总集释的话,那么必须明白,我们不是在为诸如“道”、“气”、“仁”等等词语进行原典层面疏证、定义,而是要透过这些词的生成、建构和扩张、变异的历史透视中国文化的隐秘结构。^①

培友博士这部著作对数量众多的关键词所作的研究,一是进行动态把握,把它们放到历史的生成、流变中加以考察;二是对关键词的内涵、意蕴等进行深入挖掘。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没有流于表面的描述,也没有烦琐的词义考释,而是在揭示隐秘结构方面投放主要精力,因此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这部著作由宋代理学家文道观发端,进而由文道观延伸到诗学实践。论述诗学实践,又依次深入到思维方式、诗学范畴、诗格建构。这部著作以关键词为架构的体系,水到渠成,流转自然,对学术信息所作的加工编排是很成功的。

金风送爽,稻谷飘香,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收获季节。培友博士的学术研究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段,同时也迎来了丰收的喜悦。在我为这部著作书写序言之际,他的另一部著作《宋诗品格与两宋文化生态》也行将出版。我期待这两部专著能够作为学术双璧同时推出,尽早问世,以飨学人,以慰吾心!

2015年9月1日于北京颐和山庄寓所

^① 冯黎明:《关键词研究之“关键技术”》,《粤海风》2004年第3期。

| 序 言

杨树增

记得在本世纪初，一位同龄的人文社科学者对我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算是出不了学术大师了！”我不以为然地反驳说：“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信息化时代，一台小小的电脑一上网，就可获得无法计量的学术信息，几个小小的移动硬盘就储存了图书馆所藏的你所需要的图书资料。从国家到教育部，从省市到本教学科研单位，都设立了社科基金项目，给学术研究者提供了丰厚的基金资助。并且整个社会已形成宽松的良性学术环境，提倡思想解放、学术自由争鸣，鼓励创新已蔚然成风。再无过去那种所谓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学者完全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之中，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优越的学术环境，为什么就不能出学术大师呢？”

那位学者说：“你所说的优越的学术环境与学术条件，确实如此，不过，这样优越的学术环境与学术条件不就是近几年才开始形成的吗？我们这一代人，遇到这学术大好时代时，都已经步入中老年时期。一般人文社科学术大师，往往需要四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学术积累，可是我们在精力最旺盛的年轻时期，恰逢‘文化大革命’的厄运，有的上山，有的下乡，即便分配到教学、科研部门也不能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一荒废就是十几年。人生本来苦短，我们这一代人从学术积累上失去了优势，现在不过是极少数人偶然有幸搭乘上了大好时代的‘末班车’，优越的学术条件，我们能享受多长时间？何况优越的条件，也并非没有弊端。比如各种类型的社科项目，一旦申报成功，不仅给人带来可观的基金资助，而且也给人以一定的学术声誉。这无疑激发了许多人的名利心，这种名利双收的诱惑，大概你我都恐求之不得吧。所以为了社科项目的申报成功，人们怀着如同应试期盼‘中榜’一样的心情，不再静下心来进行知识积累，而是一门心思放在申报项目的论证上。每一申报项目都必标榜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甚至宣称填补了‘某一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事实上，具有创新价值的究竟有多少呢？有的将旧说改

头换面充当新说,有的将主观臆断强命之为创新,有的以大而无当为学术视野宏阔,有的以玄谈为理论高深。如果把名利看得过重,怎能实事求是地从自己的学术实力出发,用平和的心态,以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来从事学术研究?又怎肯从事难以立项的人文社科普及推广工作?而这些又恰是学术大师的重要特征。再如我们的学术管理机制,十分重视科研项目的立项、科研成果的获奖、刊载论文报刊的类型级别,不仅给予不同的物质奖励,而且成为晋升技术职称或继续保持技术职称的重要标准。为了多立项、多获奖、多在重要刊物上发文章,定期考核,年年评聘,标准逐年加码。所以只有‘短平快’式的‘快餐’成果,才能适应这种奖励制度与考核要求,而缺少‘十年磨一剑’的精品,而十几年甚至一生磨砺精品正是学术大师的重要标志。由于诱惑太多,获取丰富的学术信息再容易,可是谁愿意长期甘于寂寞、忍受孤独、稳坐冷板凳来认真攻读经典?多是为了产生‘短平快’的作品,或为了申报项目与完成项目,才去读书、获取学术信息,而不是扎扎实实地进行知识积累。知识基础不扎实,古今中外不贯通,怎能成为学术大师……”

这位老兄喋喋不休还要说下去,我打断了他的话。我说:“如果这样挑剔,何种学术管理体制与奖励制度、评聘条例不存在弊端呢?如果学术研究者自己保持纯洁的人格操守,具备正确的学术研究动机与良好的学风,对他们来说,这样优越的学术环境又能产生什么弊端呢?我们在青春时期虽蹉跎了十几年的岁月,但也得到了社会的磨砺,积累了一定的人生感悟,这也是一种知识的积累。”

我们争论了好久,虽然各自都难以说服对方,但基本达成如此的共识: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出不了多少学术大师,充其量是个历史过渡人物。但我们这一代人又多数不太世俗,甘愿做后学的铺路石与阶梯,或如教育界常说的甘愿做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后人。为时代培养学术大师,不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贡献吗?我们的学生,从小就没有荒废学业,估计今后不会再遭遇被废止学术研究的厄运。生下来就幸运如此优越的学术环境,他们之中不可能不出学术大师。我们寄希望于他们,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培养他们的教学工作中去。

在我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比较起来,培友突出的特点是勤于苦读、敏于思索,因此大有培养前途。2002年,我从辽宁大连来到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给培友这一年级的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专业课。有一天,培友来我的住所请教问题,发现我的书架上放着一本我与赵敏俐教授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他翻了几页便提出借去细读。据他说,此书他认真读了好几遍,还书时还交给我一份万余字的读书心得。这使我很惊异,在我所指导的

研究生中,要么给我上交我所布置的作业,要么拿来他准备投稿的文章让我审阅修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研究生主动交来如此下功夫写的读书心得。我看了这份心得后,更惊讶的是他对众多古典文献的熟知,对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把握,所以对《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这部书的精髓理解得十分准确到位,提出的一些新见可以补充此书的不足。

后来由我来指导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他的学位论文题目是《〈韩诗外传〉研究》,可能就以此为出发点,确定了他今后一步步深入探讨儒学(经学、理学)与诗词关系的研究思路。培友在硕士研究生还未毕业时,就以这篇学位论文参加了北京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宣读了此文,受到与会专家的普遍赞赏,此文也被选入会议论文集集中公开出版。培友工作多年之后考取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其专业素养、外语等主要由力学、自学得来。他有现代学人很少具有的家学背景,因此其知识构成有些与众不同。入学时,与同窗学友相比,培友年龄偏大,外语水平偏低。准备考博时,一些老师及同年级同学都没有看好他。但在2005年考取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时,他的外语成绩是这一年首都师大非外语类专业考生中最好的,由此可见培友的先天禀赋,以及平日里的勤奋好学。

2005年,培友考取了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师从赵敏俐教授。他所作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北宋前中期诗词风貌与文化生态》,基本上由此确定了此后长期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向。200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培友又到北京语言大学跟随韩经太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所研究的重点是宋代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可以看出,培友的治学理念、研究方法是一以贯之的。

赵敏俐与韩经太两位教授是国内著名的学者,在他们长期悉心的指导下,培友不仅学养更加厚实,而且树立了很高的人生志向与纯正的治学理念。从2005年到如今,短短的十年时间,培友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钦慕的成果,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是他个人勤奋努力的结果,但也凝结着赵、韩二教授言传身教的辛劳,其中自然包括这部《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因为在这部著作中,能明显看到培友师承了赵、韩二教授的许多学理观念,甚至某些论证思路、笔法的运用,还透露着赵、韩二教授的学术“气息”。

赵敏俐、韩经太两位教授学术造诣颇深,是学界公认的中国古代诗歌研究领域的顶尖人物。我虽比赵、韩两位教授年龄稍大一些,但我们的人生经历大致相同,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蹉跎过宝贵的青春岁月。我们三人的研究生起点是一致的,我了解他们二人是怎样一步步攀登到国内著名学者这一高点的。也深

知他们今日的“道行”，是如何一天天修炼出来的。培友虽然学有所成，成果颇丰，但要达到赵、韩二教授的学术水平，还需经过长期磨炼。不过，我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培友到“知天命”年龄段时，在学术上赶上或超过赵、韩二教授，是有可能的。我如果能长寿一些，是会看到这一现实的。那时，我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同样也会有一种成就感。

关于《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的特色及其学术价值，我的师兄李炳海教授已作了精准的介绍。在这方面我无多少新见，于是就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些“题外话”，就算我为《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这部著作写的序言吧！

2015年7月1日于曲阜师范大学儒家文学研究所

| 目 录

序 言	李炳海(001)
序 言	杨树增(007)
绪 论	(001)
第一节 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的历史视阈与当下价值	(002)
第二节 1910—1980 年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述评	(005)
第三节 1981—2014 年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述评	(009)
第四节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015)
第一章 文道观语义层次与文、道的复杂性及多样性表达	(017)
第一节 “循名责实”文化传统与文道观的语义层次	(017)
第二节 先秦时期“文”的涵义及其发展历程	(023)
第三节 先秦时期“道”的涵义及其发展历程	(031)
第二章 北宋之前士人探讨文道关系的历史进路	(037)
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期士人对文道关系的认识	(037)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对文道关系的认识	(045)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士人对文道关系的认识	(049)
第三章 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发生、发展的时代文化环境	(061)
第一节 两宋“文章之士”探讨文道关系之中心	(061)
第二节 两宋“传统儒学之士”探讨文道关系的思维向度	(074)
第三节 两宋“佛门之士”探讨文道关系的思维向度	(081)

第四节 两宋士人文道观念的生成条件及其认识价值	(090)
第四章 两宋理学家文道观的类型、特征及其矛盾性	(092)
第一节 理学家“重道轻文”的文道观	(093)
第二节 理学家“作文害道”的文道观	(102)
第三节 理学家“文道两分”的文道观	(110)
第四节 理学家“调适文道”的文道观	(119)
第五节 两宋理学家文道观的矛盾性及其根源	(126)
第五章 两宋理学家文道观之“文”、“道”及其与道器观的矛盾性	(129)
第一节 理学家文道观之“文”及其处理文道关系的立场	(130)
第二节 理学家之“道”及其以“道器”观“文”之矛盾性	(134)
第三节 道器观、文道观的矛盾性与理学自律性缺失及其补救	(138)
第六章 两宋理学家处理文道关系的思维特性	(144)
第一节 两宋理学家的“正名”思维及其文道观的论证方式	(145)
第二节 两宋理学家的“归元”思维及其文道观的论证方式	(151)
第三节 两宋理学家思维模式与其文道关系表达	(156)
第七章 两宋理学家文道观与其诗歌实践之关系	(159)
第一节 理学家文道观念与其诗歌实践的一致性	(159)
第二节 理学家文道观念与其诗歌实践的不一致性	(172)
第三节 理学家文道观念与其诗歌实践的冲突性	(178)
第四节 理学家文道观与其诗歌实践的矛盾性根源	(185)
第八章 “文以载道”的诗学范畴表现及其诗歌表达	(188)
第一节 朱熹“气象近道”说贯通文道关系的内在思理	(189)
第二节 两宋理学“观天地生物气象”义蕴及其诗歌表达	(209)
第三节 “观物”范畴与理学诗的类型化主题及程式化表达	(221)
第四节 “求道”的目的、方法与理学诗诗性品格的建构	(239)
参考文献	(249)
后 记	(257)

| 绪 论

在中古时期的汉唐文化类型向着近古时期的宋元文化类型的转变过程中，宋型文化无论在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模式上，还是在文化特质、发展形态等方面，都具有承前启后、立法垂宪的重要历史地位。对此，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早有精辟论述。^①有研究者也指出，宋型文化不但影响本国，亦对西方有重要影响。^②可以说，宋型文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占据着非常显赫而又重要的位置。

两宋理学是宋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两宋理学表现出宋型文化的哲思精微特质和自在和乐的审美品格，表征着宋型文化迥异于前代文化的基本属性。两宋理学家充分吸收了魏晋南北朝玄学、隋唐佛学、晚唐兴盛的道教等文化因子，而建构其阔大精微的理论体系，对“宋型文化”的其他文化因子，如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学艺术等都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理学家基于理学的独特思维而展开的对于“文”、“道”关系的探讨，不但内在地会通了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影响到北宋中期直至南宋末年的诗学范畴表述方式和艺术审美取向，而且表征为包括理学家及其影响下的士人群体的诗歌实践。可以说，两宋理学家所展开的对于“文”、“道”关系的探讨，对于宋型文化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作用又伴随着宋型文化的持续发挥影响，而逐渐凝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品格。由此而言，对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① 参见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45页。

② 参见刘海峰《科举制度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第一节 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的历史视阈与当下价值

宋明理学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伴随着明代王朝的灭亡而受到了清初顾炎武等人的严厉抨击。顾氏批判宋明理学乃出于对明代士人“无事拱手谈心性,有难一死报国君”之空疏学风的深恶痛绝,其本意在于激扬士大夫事功精神,以恢复汉人王朝和儒家道统、学统。在我看来,顾氏不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深层根源出发,而把士人学风归咎为造成朝代陵替的直接原因,自是受其识见所囿,并不具备合理性。但由此而引起后来阎若璩、戴震等朴学家“釜底抽薪”式的行否定宋明理学之实,则是根本无视精神道德界的德性知识与客观现象界的科学知识的差异,极为简单地把学风与政治盛衰相联系,以逞其更新学术风尚并进而试图影响时代政治走向之宏愿。当然,依此标准要求几百年前的清人,颇有苛求之嫌。但问题是,两宋理学确乎由于顾炎武等发起而由戴震等完成的“朴学”运动而日趋衰微了。即使有后起者如李光地、曾国藩等人的大力推扬,但终至于理学发展到清代,已经运势不再,理学人物、理学思想皆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逐渐缺乏亮彩了。接续而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根本目的乃宗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试图引进西方的科学体系与民主思想来为当时的中国找到强盛之路。但遗憾的是,五四学者却循西方科学、民主之思路,强调客观、实用等功利性价值,对本土传统文化尤其是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儒学等予以全盘否定。而新传入的某些“主义”哲学,又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曲解、误读,以至于到达了如此程度:代表着哲学最高层面之一的形而上学,与代表着艺术最高层面之一的理性审美艺术,往往被这些“主义”的误读者们所猛烈批判。更有甚者,作为从事宋明理学传播、研究的学人,因此而有不少人为新文化运动参与者恶意攻击,中华文明遂遭遇了古今未有之大变局。

在随后的1949—1980年间的大多数时期,各种政治运动及意识形态的斗争等又打碎了包括两宋理学家在内的“圣像”。孔子、孟子等已然成为反动人物的代表,遑论位列“陪祠”的两宋理学诸贤。这一时期,自清代戴震开始的一些思想家为了某种目的而有意曲解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更为有意无意地误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所刻意歪曲并加以利用,以兜售其改造社会乃至传播斗争哲学的所谓先进理念。这种“革文化之命”所造成的后果,毫无异议地导致了如此结局:包括两宋理学在内的儒学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终于因其被歪曲为“礼教吃